

波蘭工潮對東歐的影響

尹慶耀

本文執筆時，波蘭工潮尚未真正平息，未來發展難以逆料。它會在東歐集團引起什麼反應？它會對蘇聯造成什麼影響？這是本文想要探究的問題。

共黨制度是蘇聯強加給東歐的，各國雖有程度上的差異，但政治方面是共黨專政，經濟方面是重工業優先，以人民的麵包與自由為犧牲，追求所謂工業化、社會主義化，基本上彼此是相同的。因此東歐的動亂，最初是要求麵包與自由，最後常帶有反共乃至反蘇的色彩。

五十年代的東歐動亂與反史有關，可以匈牙利為代表。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死亡，其繼承人馬林可夫 (George M. Malenkov) 逐漸改變重重輕輕的工業政策，東歐國家亦紛紛效鑾。同年六月東德政府發表新方針，修正重工業中心政策，並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一週後東柏林工人示威遊行，要求降低生產指標，被當地蘇聯駐軍的坦克壓平。七月間納吉 (Imre Nagy) 就任匈牙利總理，改變經濟政策，政治路線也走向民主化。一九五五年二月馬林可夫辭去蘇聯總理職務，納吉也以右傾罪名去職。整個東歐又恢復重工業優先政策，然一九五三至五五年，實為東歐的不安期間。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廿次大會，黑魯曉夫反史，並承認社會主義的多樣性。三月間波共釋放戈慕卡 (Vladislav Comulka)，六月波茲南 (Poznan) 工人暴動（詳後），十月波共中央全會中，戈慕卡當選第一書記。他在這次全會的講演，却導致了匈牙利事件的爆發。

匈牙利也曾為前此受史達林整肅的拉伊克 (Rajk) 恢復名譽，讓納吉和卡達爾 (János Kádár) 恢復黨籍，拉柯西 (Mátyás Rákosi) 把第一書記讓給格羅 (Ernö Gerö)，作為「民主化」的象徵，但實際上拒絕反史，招致以知識份子為核心的「裴多

菲（Sandor Petöfi）俱樂部」及學生的不滿。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三日晚，布達佩斯經濟大學、工業大學、陸軍大學學生、部分勞動青年聯盟會員及若干人民，為要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被拉柯西放逐的納吉復職及改善生活而舉行遊行，格羅誣指為排外的暴動，首由政治警察開鎗，繼而請求蘇聯駐軍於廿四日介入彈壓，遂致釀成暴動。同日總理赫格德斯（András Hegedüs）辭職，由納吉繼任。廿五日第一書記格羅辭職。初期騷亂中，蘇軍坦克四百輛被毀其半，經蘇匈雙方談判，蘇聯同意撤軍。二十一日蘇聯發表「關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間發展及加強友誼的原則」宣言，但同日又新增軍隊赴匈。為此，納吉強烈抗議。十一月一日納吉聲明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宣布中立，且以此立場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四日晨，蘇聯以十六個師、二千輛坦克侵入匈境，進攻布達佩斯，入夜，革命在血腥鎮壓下失敗，匈牙利另一電台宣布卡達爾已另組成「工農革命政府」。

五十年代的東歐動亂，就此在蘇聯坦克的履帶蹂躪下結束，當然其後遺症是會長久存在的。

二

六十年代的東歐動亂，是經濟改革所引起的，可以捷克自由化事件為代表。

談到經濟改革，捷克應是東歐集團中的先進。早在一九六四年，捷克就發表了新經濟制度的構想，其要點是：(1)修正中央集權的計劃制度，加強各企業的權限與責任，促進企業之間健全的競爭；(2)各企業的成績，不以生產數量為限，要依據「財政的實績（利潤）」予以評鑑；(3)企業所得應與銷售量聯結，（除上繳者外）利潤之一部可充作各該企業之獎金、投資、改善設備之用；(4)工人人工資隨所屬企業實績調整，工人的流動可較自由化；(5)採行彈性物價^①，在謀求綜合安定的同時，力圖提高品質。輸出商品應反映國際價格，提高技術水準以增強其競爭力等等。一九六五年一月捷共中央全會通過「關於改善經濟計劃，管理制度的主要原則」，同年內在二六四個企業中先行實驗，從一九六七年一月起全面實施。但由於官僚主義的阻撓以及各個企業的怠忽，改革效果不彰。

一九六八年一月捷克首領諾沃特尼（Antonin Novotny）辭第一書記專任總統。其原因：(1)諾之史達林主義色彩及向蘇聯一邊倒的立場，引起多數人反對；(2)不澈底的經濟改革，使經濟情形惡化，生活水準降低；(3)壓迫文化人、迫害作家，引起一九六七年十月捷克大學生示威及一般人民不滿；(4)歧視斯洛伐克（Slovakia），引起當地人民反抗。其時由革新派前斯洛伐克共黨第一書記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cek）繼任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一月六日捷共「紅色權利報」（Rudé Právo）公佈捷共中

註① 捷克當時擬實施三種價格即：(1)固定價格——官定價格。包括原料、燃料、電力、機械設備、食品及日常消費用品等類之主要品類，由中央規定統一價格；(2)限界價格——准官定價格。包括收音機、剃刀、尼龍襪等一般消費品，由中央規定最高與最低價格，在此範圍內企業可自行決定其產品價格；(3)自由價格——新型產品或季節性產品，可促進經濟發展或國民生活水準之提高者，可根據供求雙方企業間之直接契約或供需關係，自由決定。

央通過的「行動綱領」（將來新黨綱的基礎），強調國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政府須對國會負責，共黨僅為調整各社會團體利益的指導者。當時捷共加緊推行經濟改革，倡言改善人民生活，其投資也以住宅建設優先。

六月廿七日，正當華沙條約聯軍在捷境演習時，捷克的大學教授、科學家、文學家、畫家、作曲家乃至影劇界、體育界的七十位知名之士，聯名發表二千字宣言，在捷克四大報紙同時揭載。宣言由曾一度被諾沃特尼開除黨籍的作家瓦楚立克（Ludvík Vaculík）執筆，內容抨擊捷共過去的腐敗、專橫，對國家與人民造成傷害，斥責共黨官僚，假勞動者之名，取代資本家把自己變成國家新的主宰。另一方面，對「行動綱領」表示謹慎的支持，但深恐一九六八年一月開始的和平革命，會橫遭保守派的阻撓、破壞。聲稱要組織委員會來維護言論自由。宣言認為當時有維護一個共同目標的機會，這個目標就是社會主義。「我們要把它塑造，使其無負於我們過去的良譽與我們的自尊」。宣言中有一段文字說：「最近大家對於外軍可能干涉我們內政一事，極表憂慮。外軍力量强大，我們應付的唯一辦法，就是謙恭自守，勿先挑釁。只要政府不辜負我們之所託，並向盟邦保證履行我們訂立的同盟友好與貿易協定，我們就保證支持政府」^②。

當時捷人對共黨制度確有不滿，且有反蘇情緒的流露。但就二千字宣言而論，內容算不得過激，簽署宣言者只希望把見不得人的社會主義弄得稍為光彩些。又雖然聲言拿起武器支持政府，但已說明不先挑釁。然而，蘇聯不能容忍它的共黨體制、社會主義模式受到挑戰，更害怕捷克會倒向西方陣營，於是二千字宣言就成了「反革命」罪證。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凌晨，蘇聯糾合五個華約國家軍隊進入捷克，撲滅捷克的「自由化」運動，所謂「布拉格之春」就成了歷史名詞。不過，因捷克事件而產生的「布里茲涅夫主義」（即「有限主權論」），却在自由與共黨世界，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印象。

三

我們不能以自由世界的尺度去衡量共黨世界，但就共黨國家而言，波蘭的民主尺度要較其他共黨國家為寬。除了蘇聯以外，其他共黨國家都還保留「多黨」形式，當然實際上只有共黨專政，旁的政黨只是擺樣子、跑龍套。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共黨）是執政黨，統一農民黨是第二大黨，此外還有民主黨。現今統一農民黨主席團主席蓋茨瓦（Stanisław Gucwa）為波蘭國會議長，保有相當的獨立性。波蘭的農地，七〇%以上仍為農民私有，都市中私有住宅不少，服務行業也多係私人經營，而全國人民九〇%以上仍信仰天主教。在此種情況下，波蘭的歷次工潮，常獲得一般人民的多數同情，因而導致波蘭共黨領導階層的改組。

一九五六年六月廿八日波茲南五萬餘工人罷工，遊行示威，攻擊政府與共黨建築物，高呼「麵包與自由」口號，要求結束共黨政權與蘇軍佔領。暴動中死亡五十三人，重傷三百餘人，但部分軍人與工人結盟，致工潮不易收拾。十月十九日波共舉行八中註^② 哈里·施華茲（Harry Schwartz）原著李宜培譯〔捷克一百日〕，香港，今日世界社（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版），一一七—一一八頁。

全會，改選政治局委員，原十一名委員中有七名落選。戈慕卡復出，當選第一書記。廿日他在就職演說中聲稱：「全體勞動階級深刻不滿的原因，在我們自己，在黨的領導，在政府之內」。他曾允諾給予人民以更多的麵包與自由。共黨如此坦承錯誤，歸罪自己，實開共黨集團未有之先河。他的講稿在匈牙利報紙全文轉載，就引起了匈牙利革命事件。

在波共八中全會時，黑魯曉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Lazar M. Kaganovich）、朱可夫（Georgiy K. Zhukov）都趕往華沙，惟未出動蘇軍鎮壓。蘇聯元帥原任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波蘭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K. Rokossovskiy）被免職，波共中親蘇派亦遭整肅。

一九六八年一月波蘭上演十九世紀大詩人米基維茲（Adam Bernard Michiewicz）的名劇「列祖列宗」，劇情係描述俄國沙皇奴役波蘭之史實，故又名「俄國之奴隸」。此劇的上演，原與當時東歐的自由化有關。經蘇聯駐波大使抗議，戈慕卡下令停演，激起學生示威遊行，知識份子支持自由運動。示威者更狂呼「捷克萬歲」！「我們需要一位波蘭的杜布契克」！當局乃利用工人在軍隊掩護下進行「反學生示威運動」，終於控制動亂局面。從一月至三月，波共開除黨員八千餘名，解除六十餘名要人的黨籍及職務，其中包括部長、教授及工業管理人員。當時的總統奧哈布（Edward Ochab），本與戈慕卡合作無間，因其愛女為學生運動領袖之一，乃以眼疾為由而辭職。

戈慕卡曾以「民族共產主義」者姿態復出，惟因經濟困難，不得不逐漸靠近蘇聯而招致國內不滿。

進入七十年代，東歐比較平靜，唯獨波蘭却有兩次工潮發生。一九七〇年耶誕前，波蘭格但斯克（Gdansk）的列寧造船廠工人罷工，抗議物價上漲，要求增加工資。繼之格但斯克工業大學學生也示威遊行，且迅速蔓延到附近的各大城市。其時，軍隊出動戰車鎮壓，造成四十九人（或謂一八九人）死亡，多數人負傷。由於蘇聯陳兵波蘭邊界，波共當局以對人民讓步收拾了亂局。戈慕卡辭去波共第一書記，由吉瑞克（Edward Gierek）繼任。吉在演說中，批評「前政權在決定政策時，不會尊重民主主義」。聲稱今後「我們的經濟政策以及一般政策，必須經常符合現實，我們一定要廣泛地與勞動階級、知識份子商議，尊重民主主義」。他也是以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為諾言而登台的。

一九七六年六月，波蘭政府宣布提高食品價格，距離華沙六〇哩的拉頓（Radom）立即發生流血暴動，迫使波共當局於四小時內撤銷提高食品零售價格的法律案，工潮乃告平息。不過，這次工潮中有若干人被捕。同年九月，十四名著名的知識份子，組成「保護工人委員會」（後改為社會自衛委員會KOR），旨在給予被捕工人及其家庭以法律與金錢援助，並為其釋放而努力。但它並非波蘭唯一的人權組織。事實上，從一九七七年三月至一九七八年初，在波蘭有「保衛人權與公民權運動」（ROP CO）；「波蘭獨立聯合」（PPN）；「大學生團結委員會」（SKS）；「教育課程委員會」（TKN）等團體成立，形成波蘭的反體制運動。一九七八年九月，波蘭「社會自衛委員會」與捷克的「七七憲章」會商，籌組聯合工作小組，惟經雙方政府

阻撓未果^③。

四

八十年代的東歐動亂，是前此若干後遺症的開始爆發，以波蘭的工潮為代表。雖然同是追求自由化，五十年代的匈牙利革命，是羣衆暴動，政府被拖着走，招致了蘇聯的軍事鎮壓；六十年代的捷克事件，是政府領導革新，人民擁護自由化，蘇聯率華約聯軍敉平。八十年代的波蘭工潮，開創了一項追求自由化的新模式。首先，勞動者與知識份子結合，主要是由「社會自衛委員會」幕後指導，使得此次運動能有計劃、有組織、有秩序、有步驟地順利進行；其次，工人採取靜坐罷工（Sit-down Strike），據說這種方式是一九三四年波蘭煤礦工人所首創的。如今波蘭工人又日夜留在工廠中並不離去，集體靜坐着佔領工廠。這種和平手段，不致授予政府當局武裝鎮壓和外力干涉的藉口；最後，罷工者所提的自由化口號，都限定在現行體制之內，並不會有反府的形象，就使得當局更難處理。

一九七六年吉瑞克上台時的諾言是：「讓人民有肉吃，把商店前的長龍消除」。可是最近一次工潮，偏又從肉價問題引起。波蘭政府決定從今（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提高肉價，華沙附近烏爾賽斯（Ursus）地方的拖拉機廠工人首先罷工，並逐漸擴及全國，但以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為核心。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亞（Gdynia）地區的廿一家工廠工人，迅速成立聯合罷工委員會，以便統一行動，並向政府提出廿一條要求。波蘭政府也成立調查委員會，由副總理畢卡（Tadeusz Pyka）領導，負責研究工人的要求。

共黨國家沒有勞資糾紛，要有就是工人和政府的對立。本來，共黨國家有御用工會，工人却無組織自由工會的權利。現今波蘭當局要同工人交涉，無形中就承認了聯合罷工委員會是代表工人的組織，且與政府的調查委員會處於面對面談判的對等地位。起初，波共當局不願如此，後來免去畢卡的副總理及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改由第一副總理雅吉爾斯基（Mieczystaw Jagielski）接任，八月廿二日即與格但斯克的罷工者商談。廿四日波共召開中央全會，對黨政人事作大幅度調整，總理巴布赫（E. Babiuch）去職，由賓可夫斯基（Yu. Pinkowski）繼任。八月底，波共當局接受罷工者的要求，就廿一條內容達成若干協議^④。

儘管波共大幅度改組，吉瑞克仍難免垮台的命運。九月六日波共六中全會，一致推選卡尼亞（Stanislaw Kania）繼任第一

註^③ 詳請參閱畢英賢作「波蘭共黨及其第八次代表大會」，本刊第十九卷第八期，八五五—八五六頁。

註^④ 罷工經過、要求及協議內容，均請參閱畢英賢作「波蘭工潮的經緯」，本刊第二十卷第一期，一三四四—一三五三頁。

書記。卡尼亞聲言：「當局和人民之間，必須加強團結，這是過去所欠缺的。因此就招致了不滿、爆發、危險的結果」^⑤。

十月四日卡尼亞在波共六中全會續會上作題為「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當前任務」的報告，他承認波蘭國內形勢非常嚴重，社會緊張浪潮尚未低落，大量複雜問題有待解決。他對最近一次工潮的評估說：「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工人抗議，它不是反對社會主義，而是反對對社會主義原則的破壞；不是反對人民政權，而是反對不好的管理方法；不是反對黨，而是反對黨的政策中的錯誤」^⑥。把罪過推諉到過去的負責人身上，推諉到過去的政策路線，而不讓共黨本身受累，這是波共的一貫作風，也幾乎可說是一般共黨的共同作風。但關鍵却在這樣做能不能解決問題。

五

卡尼亞承認波蘭總的形勢十分嚴重，特別是經濟上困難甚多。卡尼亞指出，形成最近一次危機的原因是，投資負擔過重，外債超過了界限，忽視農業，對經濟政策上的錯誤和問題沒有向社會進行負責任的討論，對成就的宣傳失去了健康的理智，以及領導作風專橫跋扈和輕視輿論，因而造成「缺乏平衡，商品嚴重不足，居民收入和市場供應之間的差距太大，住房建築明顯不够」等現象。他認為波蘭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善經濟形勢，他提出的方案是「必須額外增加食品和原料的進口，根本改變市場形勢和節制開支」，同時必須對管理和領導體制進行深刻的改革和恢復經濟平衡^⑦。

卡尼亞的話讓我們想起十年前吉瑞克上台時的政策。吉瑞克曾舉借外債，從西方大量引進技術及整套工廠設備，促使波蘭經濟現代化。另一方面大量輸入消費物資，由政府津貼，低價供應人民。這項政策自然會使得波蘭對外債台高築，對內津貼費用過重，使財政不勝負擔。七十年代是波蘭由農業國進入工業國的轉型期，前五年經濟發展較為順調，後五年由於石油危機引起的世界性經濟不景氣，使得波蘭產品外銷困難；蘇聯供應的石油價格上升，產品成本提高；天候不佳農業減產等等原因，波蘭經濟遂陷入危機。現今波蘭積欠外債近二〇〇億美元，每年償本付息約七〇億美元左右，那等於西里西亞煤炭全年輸出的總價款。另一方面，共黨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基本上仍須依靠壓縮人民消費。吉瑞克政權曾提高工人工資二〇%，現今波蘭一、七〇〇萬工人的平均工資為每月一五〇美元，就當地生活而言，工資水準仍然很低，但肉類、新鮮食品、取暖用煤炭、交通費等，政府均須予

註^⑤ 以上戈蘇卡、吉瑞克、卡尼亞上台時的講話，均請參閱中村勝範作「永遠築不成的塔——波蘭的罷工」，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十月四日）第十一面。

註^⑥ 中共／新華社／（一九八〇年十月四日）華沙電有如是報導。

註^⑦ 同註^⑥。

以津貼。雖然我們無法肯定其是否正確，但日方資料指稱，這項津貼佔波蘭政府每年財政支出約四〇%^⑧。若果如此，這局面自然是難以長久維持的。可是如前所述，卡尼亞所提額外增加食品和原料的進口，豈不仍然是吉瑞克的老路線？

吉瑞克所遺留給卡尼亞的是怎樣一個現實環境呢？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吉瑞克在波蘭南部礦工業都市蘇斯諾維茲（Sosnowiec）對礦工們演說時，就已承認波蘭經濟年年惡化，短期內無法克服。他說：「異常無能，缺少一貫性，輕視義務，喪失紀律……正逐步蔓延，對於這種消極現象，必須不斷鬭爭。凡是不想承擔任務或是不適於承擔任務的，我們要斷然予以排除」。其時嚴冬將屆，但吉瑞克承認在當時的設備條件下，不可能提高煤炭生產的速度。同月十七日吉瑞克又在斯德丁（Szczecin）發主旨趣相同的演說，指摘工人爲了提高工資而施用壓力，以致勞動紀律廢弛、任意放棄職責、頻繁轉換職場、利用勞動時間作私務、欠勤人數增加等等。在這些演說中，吉瑞克也率直承認在投資方面的欠缺，強調黨的領導幹部應該認真與人民接觸，切實瞭解應在何處作何種程度的投資，以期提高投資效果^⑨。

綜合各方報導，一九七九年波蘭的經濟成長率爲負二%，農業全體負六五%，食用穀物負一〇%，穀物缺少九〇〇萬噸。如前所述，最近一次工潮，係因波蘭政府宣布自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起：(1)提高肉價，除鷄肉外提高三〇—六〇%；(2)加強勞動定額的執行等所引起。罷工結果，政府大幅讓步，新總理賓可夫斯基允將肉價凍結至一九八一年秋季，同時：(1)從一九八一年起實施五日勞動制；(2)截至同年一月將最低工資由二一、〇〇〇茲羅提（Zloty）提高至二一、四〇〇茲羅提^⑩；(3)所有商品先行供應國內市場，本（一九八〇）年度經濟計劃中國內供應量應提高三〇〇億茲羅提；(4)本年十二月應提出一九八一年經濟計劃修正案^⑪。然而，全國四、八〇〇個企業參加罷工，已造成總額三六〇億茲羅提的損失，再加上凍結肉價、增加工資、縮短工作週，豈不使經濟危機更加深刻？卡尼亞所說：必須「糾正錯誤，杜絕歪曲，恢復社會主義在波蘭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保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並耐心和進步地贏得人們對黨的政策的信任」^⑫。其實現又談何容易！

六

波蘭危機是制度性的危機。所謂共黨體制，不外共黨獨裁、反宗教、農業集體化、中央計劃制度、共黨統制工會等等。經過

註^⑧ 參閱：(1)「動搖的東歐經濟」（上），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三日）第七面；(2)土屋昌也作「前途多難的波蘭經濟重建」，日本《經濟學人》月刊（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三二頁。

註^⑨ 小穴毅作「波蘭共產社會的暗流」，日本《自由世界》雜誌（一九八〇年）七月號，六二—六三頁。

註^⑩ 官價一美元等於三·三三茲羅提，觀光匯率一美元等於一九·九二茲羅提。

註^⑪ AP（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華盛頓電，原係根據波蘭國營通訊社PAP的報導，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九月六日）第五面。

註^⑫ △新華社△（一九八〇年十月四日）華沙電。

六十年代的經濟改革，各共黨國家彼此間有些差異，但共同特徵依然或濃或淡的存在，不容易拂拭得掉。

整個東歐的經濟都進入低成長期，為能源漲價所苦，產品輸出困難，國內物價上漲，外債壓力沉重……這些不獨波蘭為然。

在東歐圈內，經濟改革最有成效的是匈牙利。一九六八年一月匈牙利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實施改革，其要點：(1)允許企業追求利潤，以提高經營效率；(2)提高企業在僱用、投資、生產方面的自主權；(3)實施彈性價格制度^⑯，某種程度地引進市場經濟因素，以謀供求關係的平衡。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同樣有弊端發生。例如一九七〇年起，已有投資過剩（各企業自行投資）、貿易赤字驟增、企業幹部與勞動者所得差距擴大等等現象發生，以致一九七五年撤換了若干擔當經濟責任的政治局委員，對經濟政策部分的予以修正。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七日匈共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政治局委員五人被解職，名額也由十五人減為十三人，除所謂年輕化外，顯然具有經濟意義。一九七九年匈牙利經濟成長率為一·〇一·五%，較計劃目標三一四%為低。匈總理拉薩爾（György Lázár）坦承現行五年計劃（一九七六—八〇年）有多項指標無法達成。匈牙利同樣有物價補貼問題，也同樣無法長期負擔，因而在一九七九年七月調整物價，計麵包上漲五〇%、電費五一%、煤炭二五%、家庭用燈油三〇%，單就食品言，平均漲幅為二〇%。一般工人平均工資每月三、八〇〇福林（Forint）^⑰，夫婦同時工作始可維持生活。在物價上漲之初，曾有示威遊行，並有「社會主義業已死亡」的口號出現。匈共第一書記卡達爾曾在第十二次大會中宣布；今後的經濟政策勢須使人民忍受犧牲，並呼籲人民與政府合作。顯然，短期內難望能有改善。

匈牙利對西方貿易佔其外貿總額四〇%，較對蘇貿易佔三〇%為高，因而必須繼續引進西方技術設備，並增加輸出以賺取外匯。相關的，其擴大企業自主性的「計劃市場經濟」模式就不易改變。拉薩爾在「十二大」中聲言：沒有存在價值的企業，國家將不能再予補助。他指稱對國內企業過度保護，將使其喪失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這顯示匈牙利不擬重回蘇聯式計劃經濟的老路。匈牙利商業協進會的一位負責人希克羅斯（音）曾經解釋說，匈牙利經濟不是社會主義與競爭原理的混合，它始終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利用資本主義的優點。這仍然是一種有限度的改革，其效果也是有限度的。此外，匈牙利經濟所受的打擊和所有的困難，也和波蘭是差不多的，雖然程度上不盡相同。

捷克的自由化遭受打擊後，經濟政策比較保守，但一九七九年七月，它也在調整物價，汽油提高五〇%、輕油提高一〇〇%、電費、煤氣、煤炭等五〇%、郵費、電報費提高兩倍。

羅馬尼亞經濟落後，也不強調改革，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前半，經濟成長率都超過一〇%，此後就逐漸降低。一九七八年十

註^⑯ 與原捷克所擬實施者略同，請參閱註^①。

註^⑰ 官價匯率一〇〇福林等於七·六七盧布（一九七八年九月），一美元等於一〇·二七福林。

一月黨大會決定的新五年計劃（一九八一—一八五年），已將平均成長目標壓低至六一七%。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古（Nicolae Ceausescu）公開強調經濟危機，聲稱一些效率差的設備、休閒工廠，應將勞動者重新分配。據西方估計，羅馬尼亞的產業平均開工率不過六〇%左右。羅馬尼亞人民雖處在羅共高壓政策下，但同樣有要求改善生活的意願。據一九八〇年八月維也納傳出的消息稱，羅馬尼亞東部工業城市卡拉提（Galati）及首都以西提哥維什提（Tirgoviste）等地，曾有因肉類不足而罷工抗議的事件發生，使當局頗為慌懼^⑯。

依據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一九七八年九月的一份報告指出，蘇聯、東歐七國積欠西方的債務，到七七年底已達四六三億美元，當年各國外債償還額佔其輸出總值的百分比為：保加利亞八五%、波蘭六〇%、匈牙利四四%、羅馬尼亞四二%、蘇聯二八%。此後，自然更有增加，至一九七八年，東歐國家對外債務總額約達六二〇億美元（未減去各國外匯準備金及輸出信用），其中保加利亞四〇億、捷克三五億、東德九〇億、匈牙利七三億、波蘭一七五億（現已近二〇〇億，見前），羅馬尼亞四四億^⑰。由此可見，卡尼亞所謂外債超過了界限，似乎可通用於所有東歐各國。

東歐除羅馬尼亞外，其能源的約七五%依賴蘇聯。過去蘇聯以低廉價格對東歐提供石油，從一九七六年到八〇年較之前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七一—一七五）的石油供應量提高五〇%；一九七五年蘇聯將石油價格提高八五%，而且此後年年加價，現今對東歐的「友好價格」已與國際市場價格相差無幾，而東歐經濟也就大受打擊。一九七九年六月「經互會」第三十三次大會時，柯錫金曾允諾將對東歐提供的石油數量增加二〇%（總量約共四億二、〇〇〇萬噸）。一九八〇年六月「經互會」第三十四次大會時，柯錫金承認蘇聯石油開採條件惡化，聲稱一九八一—一八五年的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將對東歐提供石油四億噸。如五年間共四億噸，則僅較前一個五年計劃增加一〇·八%，而不是先前預告的二〇%，則東歐的能源情況將更惡化。又羅馬尼亞一九七九年產油一、四〇〇萬噸，預計一九八五年將降至一、二五〇萬噸。據傳一九七九年羅馬尼亞已從國外輸入石油三〇萬噸，一九八〇年已締結一〇〇萬噸的輸入契約。

綜上所述，東歐經濟危機乃係普遍現象，且彼此條件大致雷同。那麼在波蘭發生的問題，也就難免會在其他東歐國家發生了。

七

波蘭當局已答應工人有組織獨立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以過去情況言，除南斯拉夫外，共黨政權都不會承認工人的罷工權。此外，波蘭允許廢止新聞檢查，也是對共黨政權的一項威脅。九月六日卡尼亞的演說中，曾經說明波蘭將遵守吉瑞克前政權對罷工

註(15) 以上資料參閱：(1)「繼續承認經濟自由化路線——反映東歐進路的匈牙利共黨大會」，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八月廿四、廿五日）第七面。(2)「動搖的東歐經濟——〔中〕〔下〕」，日本「世界週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一〇一一頁；(2)「動中澤改之作「八十年代的東西經濟關係展望」，日本「世界週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三一頁。

工人的承諾，且聲稱未來的新工會將一如勞動者所要求的，但必須以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為基礎。

回憶二十四年前，即一九五六年波茲南工潮後，曾經有「獨立工會」出現。在戈慕卡政權下，獨立工會獲得與共黨御用工會並存的合法地位。但波共當局利用政治、經濟力量優遇御用工會，使獨立工會處於不利地位，不數年獨立工會即被御用工會吸收而無形消逝。但目前波共當局所用的手段，似乎更技高一籌。

新的獨立工會原義為「自主管理」，在罷工交涉期間，當局對格但斯克工人有此承諾，雙方諒解尊重波蘭憲法，承認共黨領導，對現存國際同盟關係不持異議。波共當局規定獨立工會申請登記，不經原有的中央工會理事會，而由華沙地方法院受理。表面上這可以擺脫御用工會的控制，但工會章程在法院登記後，倘有違反即須受法律制裁。把政治行動轉變為法律問題後，是否對勞動者有利，則頗成疑問。

九月一日華沙地方法院核准了波蘭航空公司職工的獨立工會。但十月三日格但斯克獨立工會前往登記時，華沙地方法院却對該工會章程，提出十項異議。其最重要的是：(1)工會章程未明定黨的領導權；(2)原先協議係以格但斯克地區工會為對象，章程已將其範圍擴及全國；(3)章程未承認政治機關的負責人可以就任工會的高級職位。對此，獨立工會「團結」(總部在格但斯克)主席瓦勒薩(Lech Walesa)曾提出抗議，聲言絕不接受有損章程本質的修正，但願以附屬文件對黨與政府作某種程度的妥協。又稱在章程本文中既已有尊重憲法的規定，自無明文記載黨的領導的必要。十月廿四日晚，華沙地方法院核准全文四十四條的獨立工會章程，惟已將黨的領導及尊重波蘭現有的同盟關係等條項附加在內^⑯。另據美聯社華沙電訊報導，法院對獨立工會章程，增加了兩項廣泛的修正。其一是工會承認共黨的領導角色及其他共產主義原則；其二是刪除章程中關於何時與如何進行罷工的指導原則，並增列：羅工祇可視為最後的手段，應在「約束性的法律規範內」進行^⑰。果如此，則所謂罷工權實際上已近乎零。

獨立的「團結」工會總部雖在格但斯克，其志則在全國。九月半左右，獨立工會召開全國代表會議，當時在全國成立三十八個支部，參加工人四百萬，現已發展至七百萬人，乃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他們對於法院的處理自難滿意。惟十月廿一日，瓦勒薩曾在波蘭南部鑛山地帶一次集會上，要求工人對罷工慎重將事。同一天，卡托維茲(Katowice)一位領導者對記者談稱：「罷工對工人自身只有害處。我們現在糧食不足，罷工會引起饑餓與混亂」^⑱。現今波蘭各方面的人士都不缺乏理智，法院刪改工會章程一事，工人們定難滿意，惟將以何種方式反應，則暫難逆料。(本文脫稿後波政府又作讓步)。

早在八月廿七日蘇聯「塔斯社」就已抨擊波蘭罷工領導者是反社會主義份子，想使波蘭脫離社會主義道路。九月廿五日「真理報」揭載蘇聯哲學博士阿歷克西夫(G. Alekseev)教授關於「列寧論職工會」一書(一九八〇年由蘇聯職工會出版社出版)

註^⑯(17)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十月廿五日)文刊第二面。
註^⑰(18) 日本「中國日報」(一九八〇年十月廿六日)第三版。
註^⑱(19) 臺北，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〇年十月廿二日)第二面。

的書評，強調在列寧的理解中，職工會是管理與經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列寧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維護工人的權利與利益，不僅是職工會的事，政府本身就對此關心。職工會只有與工人階級黨密切合作，並在其直接領導下，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作者並引用列寧的話，尖銳地批評主張「自由」職工會的人，說他們是背離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最終目標而「自由」，是放棄全體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獨立」。蘇聯對獨立或自由工會深惡痛絕，鑒於戈慕卡、吉瑞克是因為蘇聯的不滿而垮台，卡尼亞的行動會很慎重。早在九月六日，卡尼亞在國營電視台的演說中，就強調解放波蘭與蘇聯之間的關係至為重要。為了維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邊界線、加強波蘭的安全以及解決波蘭經濟問題等等，今後非加強與蘇聯的關係不可。十四日他在波共六中全會續會上，最後談到波蘭的對外政策時，更說明同蘇聯的同盟以及同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友好關係，對於波蘭人民來說具有特殊的價值。

在較早時期，「社會自衛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的顧隆（Jacek Kuron他曾與另外十三名反體制運動領導人被捕），在接受西德「鏡報」訪問時說：「（波共）政治局所謂招致兄弟國家的憂慮，是一種威脅。除了爆發以暴力推翻現政權的事態，蘇聯是不會介入的。波蘭人民會聰明的在避免那種局面發生的情況下週旋。如果蘇聯真的介入，波蘭不會成為布拉格。阿富汗或者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將再度出現」²⁰。在波蘭罷工期間，蘇聯擺出過多少威脅姿態，甚至在波蘭邊界附近做模擬攻擊式的軍事演習。但是波蘭的工人、領導者乃至如維辛斯基（Seefon Cardinol Węgierski）大主教等宗教領袖，無時無刻不以蘇聯為念而謹言慎行。至於蘇聯，它已有四次參加瓜分波蘭的紀錄，又把共黨制度強加給波蘭，非至波蘭局面不能控制時，它也不會輕舉妄動，以免引起新愁舊恨，逆發難以逆料的反蘇暴亂。

波蘭的危機是制度上的危機，改革不容易奏效，對於工人乃至一般人民的要求，過度壓制或過多讓步，都將使問題更加複雜而困難。在蘇聯、東歐也同樣存在這些問題，波蘭工人所提的要求，也代表了鐵幕內大多數人的心聲，他們會瞪大眼睛觀看波蘭情勢的發展。據我們所知，類似波蘭的「社會自衛委員會」的反體制運動，幾乎普及到鐵幕內的每一個國家。正是為此，波蘭的獨立工會，即使是妥協性的產物，但它畢竟是誕生了。波蘭工人所獲政治與經濟權利，將在東歐乃至蘇聯引起連鎖反應。在波蘭危機期間，東西德的關係迅速冷化，羅馬尼亞的領導人中止出國訪問，匈牙利的卡達爾（Janos Kadar）也對波局表示關心。凡此，都可顯示波蘭工潮影響的深鉅。目前東歐唯一的鎮定劑是蘇聯的駐軍（東德二〇師、捷克五師、匈牙利四師、波蘭二師）。東歐人民鑒於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當時，西方均未加援手，他們的鬭爭方式或許會有所改變，但那並非問題的真正解決。如果說，波蘭工潮對東歐的影響或許不是立即的，但它却是深遠的，想來當不致有太大的錯誤。